林海音的“两地书”

史 宁

枝巢老人的《旧京琐记》一直是我喜欢的读物，还有《旧京秋词》一部都是记叙故都民俗风物的佳作，读之颇令人心驰神往。老人原为江宁人氏，光绪廿四年入京为官，遂长居京华。他善诗能文，著述颇丰，《旧京琐记》之外更有《枝巢四述》这种专门性的国学讲义，是一位典型饱读诗书的老派知识分子，一肚子尽是旧学根柢和市井回忆。老人育有八子，六子承楹，1939年与林焕文之女林海音喜结连理。这位儿媳同样因文才名于当世，最出名的自然是那本《城南旧事》。但林海音是新式人物，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与细腻，展现了一幅不同韵致的旧京风情，名气也比公公大了许多倍。林海音是台湾苗栗人，生于日本大阪，五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在京城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她笔下的故都追忆均为1948年回到台湾后所写。所谓距离产生美，许多时候这种美的前提是思念。有人说思念是一首诗，但有时，思念更像一把刀。文学史上数不清的名作多是因思乡而起。

《城南旧事》现已列入青少年必读的文学书目，但我始终觉得《城南旧事》并不适合儿童阅读，其文字背后所倾泻而出那淡淡的忧伤是不谙世事的学童所难能理解和感同身受的。书中不止一次出现作者对故乡的描述——那里是个岛，四面都是水，我们坐了大轮船，又坐大火车，才到这个北京来。《城南旧事》的故事里，总有个遥远莫及的台湾，而作者回到台湾后，又催生出昔日北京城南生活旧事的如丝回忆，北京与台湾就成了林海音生命中最为紧要且难以磨灭的两个故乡和两个书写对象。既对立又相融，既相异又近似，两地的人与事和林海音本人奇妙地紧紧联结在一起。书中的五个故事既独立又彼此相连，细品其实都是在书写别离，全书很像是一曲童年的“离骚”。更为巧妙的是，五篇故事的篇幅排列恰好是由多及少，而情感的抒发则由淡渐浓。头一篇《惠安馆》几乎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越往后篇幅越短，到了最后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仅有七页，但心怀间的愁绪经层层铺垫已臻满溢，故事戛然而止后仍余韵绕梁，久久难平。少年不知愁滋味，这种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又岂是年纪轻轻的幼学者所能参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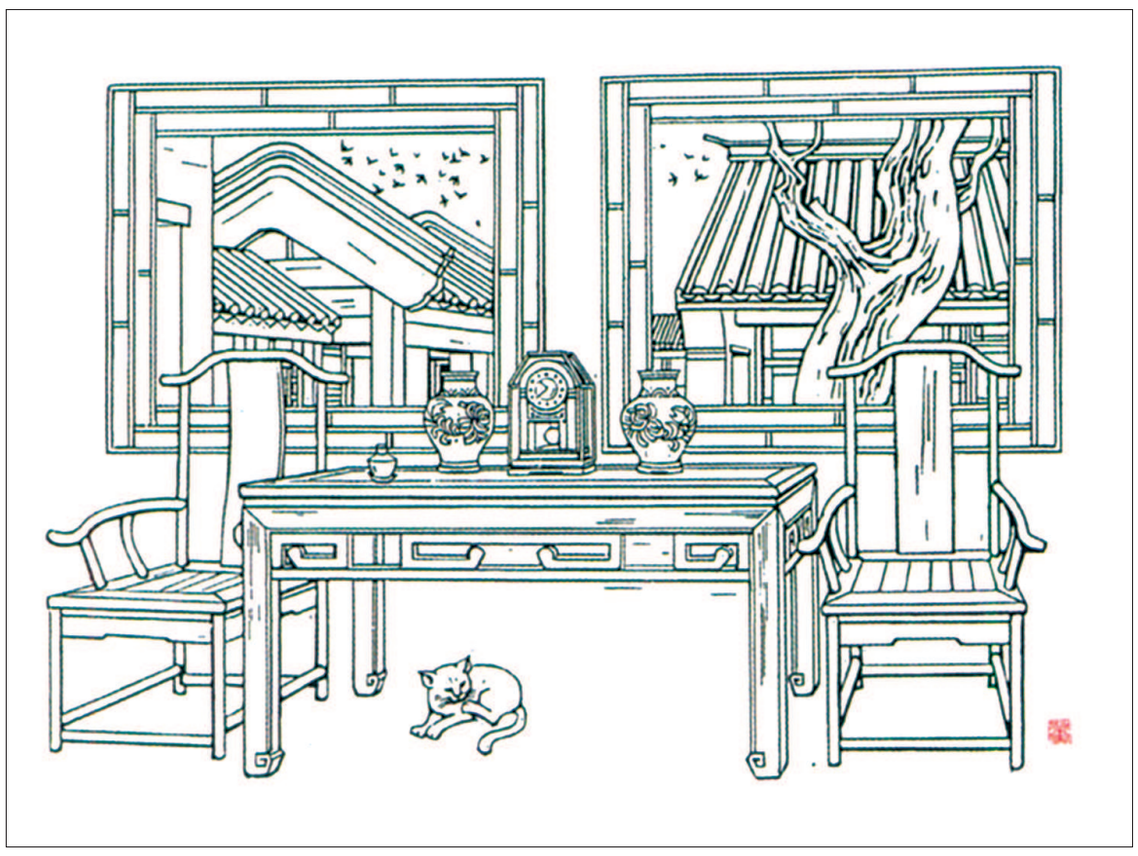
在小说问世二十多年后，吴贻弓先生根据小说拍摄的同名电影风靡一时，让许多人认识了林海音和这本薄薄的名著。电影的选角掌镜都好，特别是对旧京市井风情的氛围营造很传神。骆驼队、井窝子、胡同里的毛驴、洋车和四合院都是那么亲切而有味道。上影厂为了拍摄此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特地重新搭建了一个老北京胡同的景。由于篇幅限制，电影保留了《惠安馆》和《我们看海去》的主体内容，对《驴打滚儿》及《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做了合并压缩，但将书中第三个故事《兰姨娘》做了整体的删减。改编后的电影相对小说主题更加凝练，不到九十分钟的影片既舒缓又紧凑，既明媚又感伤。不过我以为《兰姨娘》在书中依然是个很有韵味的故事，好似前后四个故事的一段间奏，讲述的自然也是颇具离愁的一段回忆。电影一大亮点是用李叔同的《送别》贯穿全片。这段文字原本是小说里英子的课文，改编后成了电影的主旋律和背景音，与片子结合得浑然一体，脍炙人口。京城如烟的过往随着“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歌声旋律宣告了一段忧伤童年岁月的终结，好似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飘过的一缕阴霾。成长就意味着某种牺牲和分别。

和《城南旧事》几乎同一时期，林海音在台湾还出版了另一本小书《两地》。显而易见，书名所指的是北京和台湾两地。同样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作者只安排了两个部分——第一辑写北平，第二辑写台湾，笔墨相当。北京培育了林海音，台湾最终成就了林海音，两地都是林海音的母亲，共同构成了她的全部基因。在第一辑里，既有《文华阁剪发记》《天桥上当记》《黄昏对话》这类以小说笔法书写回忆的篇章，仿如《城南旧事》的番外，英子的爸妈、宋妈再次出场，就像小说的延续令读者解颐；另有一些专门怀想北京风物俗事的篇章，如《北平漫笔》里的北平秋色、女学生的制服，乃至换洋取灯儿的、卖冻儿这些琐事均一一尽述。这些文章里出现的虎坊桥、文津街和白云观等处都离《城南旧事》里不远，读来莫名亲切。作者自云：“原来我所写的，数来数去，全是陈谷子、烂芝麻呀！但是我是多么喜欢这些呢！”作者走笔的情韵和《城南旧事》一般无二，选词用字都在不经意下透着精致，有些地方甚至“比北平人还北平”。第一部分以《英子的乡恋》作结，用五封书信表达对故地亲人的追思，是最为动情用心之笔。这篇文章也成了林海音许多其他版本文集的书名，可见其重要性。第二辑台湾部分的笔调更趋恬淡。台湾是作者祖居、幼居和后半生的归宿地，同是写作当下所在的环境，因而少了写北京时一份思乡闲愁。虽然被安排在第二辑，但是这部分文章的写作时间反倒早于第一辑，是作者初回台湾后的一批作品。其写作目的实际是以台湾人的身份为大陆迁台的同胞做当地的宣传介绍，以便他们熟悉全新的生活环境。于是内容上便以写衣食住行为先，如《新竹白粉》《爱玉冰》《台北温泉漫写》《艋舺》《二百年前的北投》《台南“度小月”》等诸篇，令到过台湾的人大有会心之感。其中还有一组名为《台湾民俗杂辑》的篇目，对当地的风俗的书写可谓周全详备。全书所收录北京台湾两地的文章恰好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同时也可看成林海音写给北京和台湾两地的情书。

2011年起，一批主题为《他们在岛屿写作》的纪录片，把目光瞄向在台湾写作的本土作家。绝大部分拍摄对象都健在，仅有林海音是已去世的一位。这一集的题目也叫《两地》。操刀的是著名纪录片导演杨力州。回到台湾的林海音除了写作，还是一位知名出版人，五十年代受聘于台湾《联合报》副刊，担任主编一职。后来独立创办文学杂志《纯文学月刊》，担任发行人及主编，发掘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台湾文坛的中坚力量。因此林海音常被人们称为台湾文学的教母。影片中受林海音提携过的作家们，如黄春明、隐地等人满含深情地回忆这位慈母当年的伯乐之恩。还有齐邦媛、余光中在林海音追思会上的讲述，都是十分打动人的。而最令我动情的则是片中林海音和女儿夏祖丽两代人先后重访北京南城的画面。林海音在《英子的乡恋·后记》中写道：“我现在很怀念第二故乡北平，我不敢想什么时候才再见到那熟悉的城墙、琉璃瓦、泥泞的小胡同、绵绵的白雪……”1990年，林海音终于回到了阔别四十多年的北京，重新回到南柳巷的晋江会馆，这里是父亲去世后她和母亲居住的地方。林海音操着一口匀净的北京话，不失温婉地和院中住户聊天忆旧笑谈沧桑。已经成为林先生的林海音彼时又变回了小英子。九年后女儿夏祖丽也走访了晋江会馆，向老邻居询问母亲的往事。她还重新探访了协和医院礼堂，那是林海音和夏承楹1939年5月举办结婚典礼的地方。镜头里的夏祖丽回忆到最后，眼中泛起泪波，她似乎明白了北京和台湾对林海音究竟意味着什么。整部影片都是在这种如泣如诉的基调下推进的，观者透过她的书桌、生活圈、编辑台重新认识了北京城南的小英子和台北城南的林先生。

林海音说：“想起北平，就像丢下什么东西没有带来，实在因为住在那个地方太久了，就像树生了根一样。”其实，与林海音有着相似经历的北京迁台文人不在少数，他们到台湾后也纷纷写出了各自的北京记忆。从齐如山到溥心畬，从梁实秋到唐鲁孙，被海峡分隔的两地，割不断的是浓稠难解的乡思。不久前听说北京西城区首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名单中列入了晋江会馆，不远的将来这里将变身林海音文学展示中心。我切盼这所小院能早日开放，让更多人感受到林海音对两地故乡的缠绵情愫。

2021.7.9



老房子（木刻）高荣生

夏夜听评话

谢 冕

他一袭青衫，斜挎着简单的布包袱，一片钹，一根竹筷，一只戒指，加上一块惊堂木，这就是他演出的全部行当，我们称他“评话先生”。评话先生通常在乡间集市、特别是喜庆之家赶场，演出的是福州评话，全程用福州方言。他多数时间在“讲”，只有大的转折时加“唱”，唱时他左手持钹，右手用竹筷敲打，边敲边唱。这时，我们知道情节将有大的转折，紧张的叙事到此告一段落，听众在评话先生的吟唱中也得到片时的调整，期待着另一个紧张情节的开展。整个的评话会场听众全神贯注，时而紧张得屏住气息，时而轻松得显出笑容，听众的情绪全被他一个人的演出所左右。

评话多是说古，一般取材于稗史和民间传说，在我的记忆中极少现实题材。那时我们听评话，就是要听以往朝代的故事，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件，如“狸猫换太子”之类。隋唐演义，七侠五义以及公案小说如施公案、包公案等。吉庆人家，为了还愿谢神，或三五日，或十天半月，每日“接着讲”，是一个又一个的“连续剧”。听众都是些乡民，成年人和小孩，先生讲得很通俗，乡间俚语，大家不仅听得懂，而且兴趣盎然。

评话是传统说书的一种，有一人单口、二人对说以及多人同台演出的多种方式。福州评话则是“独角戏”，翻山倒海，惊天动地，自始至终全由一人演出。福州评话源自唐宋以来的“说话”，即讲故事之意。敦煌卷子写本发现有唐代的说话话本《庐山远公话》等，是非常古老的说话本子。古代传下来的说话形式众多，有“小说”“谈经”“讲史书”“说浑话”等。在我听到的福州评话中，通常多“讲史书”一类，很是奇怪，从来没有遇见“说浑话”的。可见，当日的评话先生很是“自律”。

我那时念小学，许多历史知识，都是评话先生教我的。讲评话是乡间习俗，也是平常生活中的一个节日。乡里的大庙今晚有评话，全凭口传，不贴布告。讲评话往往是夏日的夜晚，晚凉初透，蛙鸣在野，新月斜空，萤火虫隐约于禾田间。此时晚风飘拂，带着稻花的清香。正是晚间休憩的时辰。为了听评话，乡民们早早吃了晚饭，自带座椅，手摇蒲扇，悠闲而来。

每当此时，平日寂静的大庙顿时热闹起来。大庙一角的烧腊小摊，灯火阑珊，油香四溢，一时又多了些酒客。

评话先生登场，只见他青衫一捋，这边惊堂木一响，全场静默，评话就开场了。评话散场正是夜阑时节，乡民们带着满足的心情一路说笑着各自归去。南国夏夜，蛙鸣起于四野，一轮弯月凌空，满天星雨，散落树梢。

那时我住在福州郊区叫做程埔头马厂前的一个地方。马厂前的前街，就是如今很有些名气的马厂街。那里的沿街两旁都是西式的洋房，寂静的花园，三角梅悄悄地爬过墙头，沿街时闻优雅的钢琴声。这里住着一些从事邮政、海关、医务，以及宗教事务的从业者，因为多半受过西方教育，他们的住宅清雅，遍植花木，整条街充满欧陆情趣。

福州是五口通商的一座城市，随着门户的开放，中外商贸往来频繁，传教士、商人、学者、旅行者，他们带来了我们陌生的西方文明。我此时居住的南台沿江一带，外来者在这里建教堂、开医院、办学校。当然还有时髦的咖啡厅、西餐厅和电影院。遇到圣诞节或西方的其他节日，中外的信徒们歌舞狂欢，也是通宵达旦，显现出一派异域风情。而与此同时同地，中国民间的迎神大游行，以及水上疍民沿街唱曲祝福的歌唱与之并行不悖，香火、鞭炮、锣鼓喧天，以及清脆的歌吟，一片欢天喜地！

这情景，与我此文开头描述的大庙中的评话现场，是同一个社区，同一街巷，也是同一时空，不仅构成了视觉上的极大反差，而且呈现了不同文明“华洋杂处”的生动状态。人们不禁发问：一边是极富中国乡土风情的、建立于农耕文明而世代相传的风俗图卷，一边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咄咄逼人”的气势，究竟是何种伟大的力量而使本土的文明，能如此自信且顽强地坚持着和赓续着？

我的童年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文化环境中。当时年幼，所知不多，一切都自然，也一切都合理。后来知道得多了，乃知各种文明有其各自的生长和存在的缘由，文明并无优劣、高低之分。唯有开放的世界容纳多种文明，使之风云际会，共生共存，世界于是才呈现出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2021年7月12日
于北京昌平

闻一多与唐亮画展

陈建军

唐亮是一位近乎失踪了的画家，已出版的各种中国美术家辞典均不见著录其姓名及生平事迹。

据《清华周刊》《清华年报》《清华同学录》等文献资料中的零星记载：唐亮（1904—1944），字仲明，江苏吴江人。1918年考入清华大学，1926年毕业。在校期间，曾加入闻一多等人发起组织的美术社，任丙寅级评议员、平民学校校长，教育学社、世界语研究会、车驴夫阅览所等学生社团成员。1927年留学美国，专攻西洋画。三年后，转赴巴黎深造，其作品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览。1933年8月归国。1944年秋病逝。除绘画外，其生前还在《大公报》《艺浪》《上海艺术月刊》等报刊上发表有《安格尔》《西班牙访画记》《到浪漫的西班牙去》等文章。

1933年暑期，时在老家吴江的唐亮给闻一多写了一封信，托闻一多“找事”。闻一多“一因找事无办法，二因近来懒于写信的恶习，竟没有回信给他”。1934年1月11日，唐亮的同学李效泌（效民）拜访闻一多。得知唐亮“仍是失业而且穷到连从家到上海的路费都没有”，闻一多于是同李效泌商量，叫唐亮马上带作品到北平，先开一个展览会，再替他设法在严智开筹备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谋个教职。在家庭开支紧张、生活极其窘迫的情况下，闻一多给唐亮寄了40元，并称唐亮来后可住在他家。闻一多之所以决计“救”唐亮，是因为好友朱湘的死对他打击很大，令他动了感情。他曾劝饶孟侃（子离）不要寄钱给朱湘，以为“寄了给他，不见就救了他的命”。为此，他“总觉得不安”，仿佛“应负点责任似的”（《致饶孟侃》，《闻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273页）。所以，他援助唐亮，就是不希望看到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唐亮到北平后，一度住清华园顾毓琇（一樵）家，但常在闻一多家里作画。

经闻一多等人策划和张罗，1934年2月3日至10日，唐亮画展由欧美同学会、清华同学会主办，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展览室设在该会西客厅内，占房两间，陈列人物、风景、静物、构图等作品计八十余幅。

在展览正式对外开放之前，闻一多与顾毓琇、梁思成、林徽因、叶公超、饶孟侃等人联名写了一封邀请函。此函未见有论者提及，不妨爰录如下：

迳启者，友人唐亮先生，留学欧美有年，专攻美术。顷自巴黎归来，定于二月三日（星期六）起，至十日止，将其作品八十余件，由欧美清华两同学会主办，展览于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兹特订二月二日午后二时，薄备杯茗，专邀友好参观，务祈拨冗光临为荷。

顾一樵，梁思成，余上沅，林徽音，叶公超，金岳霖，闻一多，李效民，李唐晏，饶孟侃同启。（《美术家唐亮在平展览作品》，《京报》1934年2月1日第5版）

2月2日下午，被邀约前往欧美同学会参观者约110人，大部分是北平各大学的教授（清华大学居多）和新闻记者。据天津《大公报》记者报道，展览室“入门处备有签名簿册，签名后，即分给与精美目录一册，册首有闻一多《论形体》一篇介绍唐氏绘画，约一千数百言，对唐氏绘画在形体表现之成功，阐明綦详”（《唐亮画展今日起开始》，天津《大公报》1934年2月3日第1张第4版）。所谓“精美目录”，即指《唐亮西洋画展览》。这本小册子共13页，内收《园丁》《画室之内》《静物》《吴江仙里桥》《休息》《素描》和《速写》等七幅画作及全部展品目录，册首有闻一多《论形体——介绍唐仲明先生的画》。2月3日，闻一多的这篇文章又发表在《北平晨报·北晨学园》第635号。顺便一提的是，《论形体》没有收入开明书店1948年版《闻一多全集》，朱自清等人虽将其题名（《绘画展览目录序》）早已编入“拟目”里，却始终未找到原文。全集出版以后，朱自清从闻一多遗稿中检出一篇《匡斋谈艺》，刊发在《文学杂志》1948年9月第3卷第4期。《匡斋谈艺》共三章，第二章即《论形体》的主体部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闻一多全集》收录了《论形体》，但所据并非“原载”，而是由陈梦家整理、重刊于1956年11月17日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上的文本。“笔会”上的刊文在文字上与画展小册、《北平晨报》略有出入，其文末的“一九三四年一月，北京。”当是陈梦家添加上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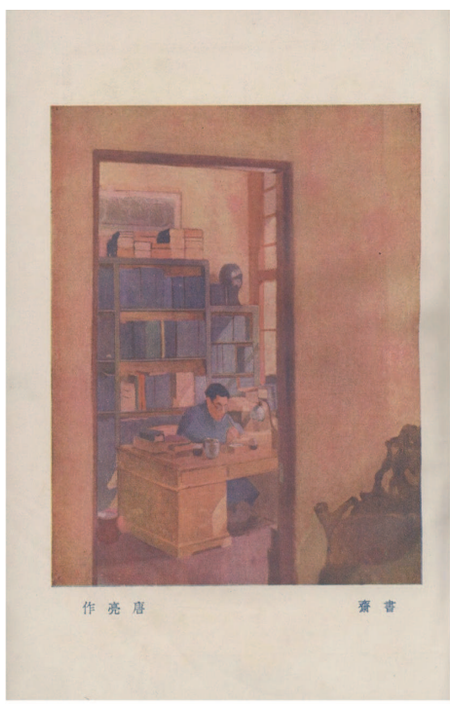
欧美同学会展览完毕，唐亮又于3月3日、17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两次画展，并连续作了三次演讲，即《艺术欣赏》（13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19日）和《十九世纪的法兰西艺术》（20日）。3月31日，天津市立美术馆举行画展，唐亮应邀参加。4月4日至6日，他在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举行了三天的个人画展。这次展览新增了数幅作品，其中一幅题为《闻一多先生的书斋》，是他在闻一多家里画的，曾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34年4月4日第5期上登载过，“可惜印刷得糟糕，简直是一塌糊涂了”（柳亚子《看了唐仲明画展以后》，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1934年4月25日第8期）。这幅作品后载《东方杂志》1935年10月1日第32卷第19号（秋季特大号），题名《书斋》（右图）。

唐亮的画展在平津地区引起了很大反响，连俞珊、冰心也都前往参观过。但对其画作，可谓众说纷纭，评价不一。

朱自清在1934年2月2日的日记中简要记载了叶公超、章晓初、李健吾等人的观感：“下午至欧美同学会看唐画，据饶子离云，静物数帧曾入沙龙。余不敢批评，公超谓静物最劣，无吸引力，素描最好。所画余上沅夫人，章晓初谓非说明不认得也。问健吾，谓以前诸作只习作，回国后所作吴江风景为佳。又公超谓中国题目太少。”（《朱自清全集》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页）刘半农在1934年2月10日的日记中云：“下午到欧美同学会看唐亮画展，其人功力甚深，于光与色均有精到之研究，油色速写尤别致。”（《刘半农日记（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六月）》，《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

不少人认为，唐亮的绘画“技术上很成熟，取材离开现实”（克夷《唐亮画展》，天津《大公报》1934年2月12日、13日第4张第13版《本市附刊》）；“唐氏作品之最显著的缺陷，便是他对于现实生活的漠视”（燕《观画记——唐亮西画展的观后感》，《华北日报·副叶》1934年2月11日第571期）。闻一多则在《论形体》中高度肯定了唐亮绘画的价值和意义，在他看来，“形体是绘画中的第一义，而且再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他认为，“仲明先生在绘画上的成功是多方面的，内中最基本的一点，是形体的表现”。

对唐亮的绘画虽然见仁见智，但他的画展无疑是成功的。展出期间，他还售卖了一些作品。同时，他被聘为北平艺专西画教授。这一切，与闻一多的全力“救助”是分不开的。



唐亮作 书斋

笔会

谈艺录

『文汇笔会』微信二维码